

## 逯钦立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

张连科

回顾百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,从刘师培、黄节、鲁迅,到王瑶、曹道衡等等,可谓名家辈出,硕果累累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逯钦立,以其持久不懈的努力,为百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增添了光彩。

逯钦立,字卓亭,笔名祝本,山东巨野人。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,第二年转入中文系。1937年抗战爆发,逯钦立和北大同学一起南下。先入长沙,后进昆明,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。1939年毕业,旋即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,师从罗庸、杨振声二先生(以前者为主)。研究的专题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,及同时期文学史。在导师罗庸的指导下,逯钦立从1940年开始校辑隋以前的古代诗歌。这是一件艰苦而枯燥乏味的工作,尽管此前冯惟讷、丁福保等人曾经对这一段诗歌进行过整理,但是逯钦立也还需要从数百种书籍中,逐一摘录、校勘,写下作者小传、校记,及其主要出处。他埋头苦干,而且一干就是7年。当我们今天手捧着近二百万字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的时候,就会不由自主地对逯钦立那种耐得住寂寞、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,表示由衷的敬意。

1941年,逯钦立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四川南溪李庄,此后就在该所担任助理研究员。1946年,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回南京。从此时起至1950年初,他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多,而且质量也高。像他的《古诗纪补正叙例》、《汉诗别录》、《说文笔》等文章,都发表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刊物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上。1948年,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,历史语言研究所也一同前往。所长傅斯年对逯钦立非常器重,多次劝其同去台湾,但被婉言谢绝。逯钦立失去原来的工作,当时局势动荡不安,新工作很难找,他几经周折,最后由广西大学校长陈剑峰

聘为该校中文系副教授,遂携眷前往桂林任教。到达之后,傅斯年又来信敦促其赶赴台湾,并寄来三个月薪金,但被其第二次谢绝。

1949年底,广西解放,逯钦立参预广西大学的接管工作(当时已任教授),并负责中文系系务。1951年秋,逯钦立经人介绍到达长春,任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后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。1961年春,逯钦立对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旧稿进行重新整理,到1964年2月编纂完成。这部厚厚的、耗费了他多年心血的书稿,终于大功告成,交中华书局出版,使他感到非常欣慰。可是天有不测的风云,谁也没有想到两年后“文革”开始。这部书稿在中华书局一压就是将近二十年,到1983年出版之时,遗憾的是逯钦立已经无法见到了。1973年8月6日,逯钦立在赶赴学校途中,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,终年63岁。

文学研究首先面对的是文学作品,这是研究的基础。若是文学作品不可靠,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。逯钦立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,选择的专题之一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。而先秦的诗歌,除去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之外,余下的作品就很少了,其重点实际上就是在汉魏六朝时期。为了使人们能够得到这一时期可靠的文学材料,逯钦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其主要成就表现在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上。

为了编成该书,逯钦立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,即搜集材料、鉴别真伪、整理校勘。

中国隋代以前的古籍,原本极为丰富,但是由于唐、五代、宋、元各代战乱兵燹,接连不断,书籍损失极为严重。至明代,原来的旧集几乎百不存一。隋以前的别集,当时只剩下嵇康、阮籍、陆云、陶渊明、鲍照、江淹六家而已。所以,一些有心人便开始搜罗材料,编纂总集。其中成绩显著者,当

收稿日期:2009-01-10

作者简介:张连科(1955—),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、古籍整理、中国文学文献学、中国学术史。

属冯惟讷。他编成《古诗纪》一书，共156卷，材料较为丰富，被誉之为“自上古以至陈隋，网罗放失，殊有功于艺苑”（《列朝诗集·冯惟讷小传》）。然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，“其中真伪错杂，以及抵牾舛漏所不能无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集部·总集类·古诗纪》）。为此，清代冯舒作《诗纪匡谬》一卷，纠正其失误112条。民国初年，丁福保根据《古诗纪》、《诗纪匡谬》，编成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54卷。虽然纠正了此前的一些失误，但是由于其并非专门研究隋以前诗歌之人，许多问题他也弄不懂，所以仍然存在着不少错误，而且和《古诗纪》一样，所录诗作一般不注明出处。清末杨守敬鉴于《古诗纪》的失误，写成《古诗存目》144卷。既逐篇为之索引，同时又补充了一些篇目。可惜的是，这仅仅是个“存目”，未能编成隋以前的诗歌总集。

逯钦立以杨守敬的《古诗存目》为搜集材料的主要线索，翻阅了有关图书数百种，仅引用的书就达254种。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书籍，皆在搜集的范围之内。在搜集材料时，逯钦立特别注重民间谣谚和新发现的东西。例如先秦诗歌，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单行既久，后之选者大多不录，除此之外，余者以民间谣谚为主，丁福保对此弃之不顾。逯钦立则尽力搜罗，虽只言片语，亦不疏漏，如《涂山女歌》、《丰歌》，皆为四字，亦录入集中。他在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·后记》中，不无自豪地说：“尤其是我们整理出大量的民间谣谚，作为这时期民间诗歌文学的作品资料，是可以满足研究者的要求的。”对于新发现的材料，他更是极为关注，例如在本世纪初，敦煌写本沉睡千年之后重见天日，其中有西晋王浮所作《老子化胡经》，第十卷为《玄歌》37首，逯钦立将其全部收录。此外，如汉简中的《风雨歌》，日本保存的《文馆词林》残卷中各诗等等，都被录入该书之中。前人编各代总集，喜欢冠以“全”字，如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、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等等，而实际上却不可能全，即便搜罗再广，也会有所遗漏。逯钦立深明此理，所以在其辑校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中，没有加上“全”字。尽管如此，该书却仍然是一部中国隋以前诗歌的最为完备的总集。

搜罗完备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而对材料进行综合分析，明辨真伪，剔除芜杂，则更加困难。隋以前诗歌，距今年代久远，在流传的过程中，真伪混杂，非智者不能辨也。我们试举二例，说明逯钦立在辨伪方面所作的工作。

其一是关于“苏李诗”。“苏李诗”指所谓苏武李陵答赠之诗，《文选》录7首，《古文苑》录十首，其他零星之句，还有4条。另外，逯钦立还考证《古文苑》所载孔融《杂诗》2首，亦为此类诗歌。一般人们所言之“苏李诗”，主要指前之17首。冯惟讷将前7首录于《汉诗》卷2，后10首附在《汉诗》卷十，认为《文选》所载，为苏李原作，而《古文苑》所载，为后人假托。丁福保则将《文选》、《古文苑》所录各诗，分别编之于苏武李陵名下，认为这些诗确实为二人所作。逯钦立没有盲从前人，而是首先详细考察其流传情况，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：其一，“宋初迄于齐末，仅有李陵诗之见称以及模拟，而无所谓苏李诗”；其二，“苏诗出于李集，本为李陵诗，好事者以其总杂，故妄增苏武名字”（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5—6页）。然后，再分析其内容，从其内容之芜杂而无合于李陵身世者来看，判定其并非李陵所作。那么，这组诗的作者究竟是谁呢？逯钦立通过对其用语的时代性，及其所示时地的相关性来分析，认为组诗的作者为东汉末年灵帝、献帝时南迁避难的文人。论据有力，结论亦令人信服。

其二是关于《胡笳十八拍》。朱熹在《楚辞集注·后语》、郭茂倩在《乐府诗集·琴曲歌辞三》中，都认为作者是蔡琰。冯惟讷、丁福保一仍其旧。当然，古人对此也有反对者，如宋代王观国、明代徐世溥，都认为此诗乃后人咏文姬之作，非其自撰。对古人之说，逯钦立没有盲从，而是通过详细考察其流传过程，得出结论：“可见唐代始有十八拍之曲名，宋时始将十八拍曲归之蔡琰。然皆由蔡琰《忧愤诗》‘胡笳’一语附会而成者，则今存之十八拍辞，其非蔡琰所作者，明矣。”（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145页）这是在四十年代初，逯钦立辑校汉诗时得出的结论。到1959年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《胡笳十八拍》是否为蔡琰所作的大讨论，逯钦立又从其思想内容、遣词造句、押韵方式等方面加以考查，证实该诗非蔡琰所作。所以，逯钦立在辑校蔡琰诗作时，把《胡笳十八拍》附录于后，把自己的观点压缩成五条证据，加以简要说明（见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201页）。其观点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。

辨伪需要过硬的学术功力，但必须辨伪的诗作毕竟不太多，而校勘则是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。这项工作每一首诗都有，逯钦立搞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多年，其主要工作应是校勘。一方面有中国

当时第一流学者的传授与切磋，另一方面逯钦立本人也刻苦钻研，积极探索，所以在校勘上他也很有体悟和创获。在《古诗纪补正叙例》中，他把所得总结成八个方面：（甲）作者姓名似异实同例，（乙）题目窜乱例，（丙）章法可以互校例，（丁）依韵校勘例，（戊）句法校勘例，（己）拟作原作可以互校例，（庚）以用事校勘例，（辛）就用辞习义校订例（见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119—133页）。

逯钦立在校勘上之所得，实不仅以上八事。尽管如此，他并不以此自矜，对所录各诗，即使是可断定某字为误，一般也不擅改，而是在校记中加以说明。这样，既可纠正旧的错误，还能避免新的失误，充分表现了他对古籍整理严肃认真的态度。而其辑校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一出版，立刻就被学术界所重视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## 二

逯钦立一生最喜爱，而又研究最多的诗人，是陶渊明，这恐怕与其师承有关。其导师罗庸亦深好陶诗，著有《陶渊明》一书，其中有陶渊明的传记、年谱、诗文系年、陶集版本及注本等内容。可惜的是此书只存稿本，并未印行（见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》第六辑《罗庸教授年谱》附《著作目录》），世人难知其详。

从1940年开始，逯钦立在导师罗庸的指导下，对陶诗进行校勘，到1973年逝世之前完成对《陶渊明集》的校注工作，其间虽然时断时续，却整整33年，可以说是陶渊明研究伴随他走完了自己的学术之路。

四十年代，逯钦立专心于学术，所取得的成果也比较丰富，其中发表了6篇陶渊明研究的文章：《陶渊明行年简考》、《陶潜里居史料评述》、《形影神诗及东晋之佛道思想》、《述酒诗题注释疑》、《陶渊明年谱稿》、《洛神赋与闲情赋》。除去第五篇之外，以上文章都被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收录。

逯钦立研究陶渊明的第一篇文章，是《陶渊明行年简考》，重点谈其生卒、仕宦、里居三个问题。关于生卒，逯钦立当时认为，陶渊明出生在377年，去世在428年，寿51岁。关于仕宦，重点谈其为镇军参军是仕于刘裕帐下。关于里居，重点谈其三处居所及迁居时间。《陶潜里居史料评述》则详细考察柴桑、栗里、上京三地之所在。旁征博引，材料详实，论证有力，表现出作者在考证上的功力。《述酒诗题注释疑》侧重于对陶渊明反抗暴政思想的研究。

《述酒》一诗，词义隐晦，通篇用典，历来以难解著称，逯钦立在校勘的基础上，继续对此诗进行阐发，认为其中以酒为喻，先遣责桓玄，后抨击刘裕，叙说有次。《形影神诗及东晋之佛道思想》，通过探讨陶渊明对当时流行的佛道思想所持态度，进一步研究其思想见解及人生观。陶渊明对佛教之神不灭，道教之形长存，均持反对态度。而自然一义，乃陶渊明安身立命之所，文章对此论述得比较详细。《陶渊明年谱稿》是作者参酌了梁启超《陶渊明年谱》、古直《陶靖节年谱》之后，列举了四项证据来证明陶渊明活了52岁，这是对他自己原来主51岁说的修正。《洛神赋与闲情赋》，意在说明曹植《洛神赋》与陶渊明《闲情赋》是同一类作品，皆属沿袭《离骚》以好色喻好修，“托好色之不成喻好修之不成而敷陈其悲观主义者是也”。这实际上也就根本否定了萧统“白璧微瑕者，唯在《闲情》一赋”（《陶渊明集序》）之说。六十年代，逯钦立重要的研究陶渊明的文章是《读陶管见》。与其从前的文章相比，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阶级分析的内容。此文较长，共分十二个部分，是其多年研究的心得体会。其中涉及了陶渊明生平、思想、作品等多方面问题，有些观点是很有创见的，例如第十一部分《陶诗的艺术性问题》，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。第一，写实的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没有使用“现实主义”这个时髦的名词，而是先引证古人对陶渊明“真”、“真实”、“真率”的论述，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其形成原因。第二，拟人化手法。重点谈其以拟人化来抒情，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。第三，自然风格与韵律美。对陶诗的自然风格，人们论述较多，而对韵律美则谈得很少。作者重点讲其以连环句式即顶真手法，来加强逻辑联系和韵律美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这些观点都是很有意义的。

当然，逯钦立研究陶渊明的最重要成果是《陶渊明集》。该书由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，此后又两次重印，印数已达十多万册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陶渊明的集子在古代流传很广，版本很多。而各种版本之间的差异，早在宋代就已经成为问题。这使得历代注家和研究者在对作品的理解上，意见分歧，莫衷一是。所以，对陶集进行精确的校勘，就成为当务之急。逯钦立以元初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为底本，再参以数种价值较高的本子，先进行精心的校勘，再做仔细的注释。对能够判定写作年代的，一般在注释的第一条加以说明。对没有把握的，也不强做系年。注释简洁精炼，要言不烦。为了便于

一般读者，语言尽量通俗化。若引用前人注释，一定要加以说明，以示不掠人之美。一般不引经据典，但在有助于理解作品原义时，可以例外，如对《饮酒》“此中有真意”一句，注云“真意，自然意趣。

《庄子·渔父》‘真者，所以受于天也，自然不可易也。故圣人法天贵真，不拘于俗。’”（《陶渊明集》89页）这样，既可避免烦琐，又能加深对作品的理解。由此可见其良苦用心。

在此书的最后，还附有作者的两篇文章和《跋》。第一篇是《关于陶渊明》。此文一开始便说明陶渊明生于365年，卒于427年，主寿63岁说。这是他第二次修正自己的观点。陶渊明的年寿，是逯钦立始终注意的问题，因为这关系到作品的理解和系年。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，使他认识到，无论是梁启超的56岁说，还是古直和自己原来的52岁说，都是似是而非，都是不能成立的，所有证据都不足以推翻史传上的63岁说。在《跋》中，他还详细说明梁启超、古直和自己过去提出的证据之不可靠。这种敢于纠正错误的勇气确实可嘉，同时也说明，他一生都在学术上不断追求探索。因为该文作于“文革”中，所以也打上了当时的烙印，这就是对陶渊明进行阶级分析，上纲上线。而作者的本意却是在政治许可范围内，研究陶渊明，让人们了解他，以便进一步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。该书所附的另外一篇文章，是《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》。这是逯钦立根据63岁说为陶渊明编写的第二个年谱。

总的来看，逯钦立校注的《陶渊明集》尽管不是很完美，但目前仍然是陶集中比较通行的一个校注本。

### 三

逯钦立不仅在陶学研究上成就卓著，而且在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其它方面也有较大贡献。首先，对汉代诗歌，他有系统的研究，其主要成果表现在《汉诗别录》中。该文洋洋洒洒，约6万余字，收入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中，分辨伪、考源、明体三部分。

汉代诗歌，距今年代久远，真伪混杂问题较多。逯钦立对“苏李诗”、“班氏诗”、“古诗”、“柏梁台诗”一一辨析，剔除伪作，判定写作年代，为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中国诗歌体裁丰富，但以五言、七言为主，所以逯钦立在辨伪之后，便进一步考察此两体产生源于何时。古今学者大多认为五言产生于汉代，若具

体到汉代何时，则分歧较大。为了弄清这个问题，逯钦立先定下三条标准：一是凡称五言诗，必须通篇五言，二是五言诗不得含有“兮”字，三是将五言的产生定为发生期和成立期。此处虽说是三条，实际上是以前两条为主。这样，就把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（只有半章五言）之类，及后之带“兮”字的“楚辞体”诗，从五言中排除出去。经过广泛搜集材料，认真考察，逯钦立判定从汉武帝到汉章帝为五言的发生期，从汉章帝到汉灵帝为五言的成立期。而班固的《咏史》，是两个时期之间转折的标志。

汉代七言，本不成熟，然其产生，却有迹可寻。逯钦立通过深入研究，证实七言诗亦产生于汉武帝时期。七言出于《楚辞》，此为常识，但却不能说七言与《楚辞》同时产生。逯钦立把东方朔所作《七言》当作七言诗产生的标志，并认为刘向句句实字的《七言》才是七言诗的正格。他把汉代七言诗分成三类一为中间含“兮”字之类；二为句句用韵之类；三为句中用韵之类。其中第二类为七言正格，在此之后得以发展壮大。

逯钦立在“明体”中，重点考察汉代的乐府民歌，特别是对其声辞杂写的探讨，很有启发意义。

对魏代诗歌，逯钦立原来计划写《魏诗别录》，但后来因事耽搁了。到1959年，逯钦立参加了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讨论，发表了两篇文章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《在文学史上应该怎样评价曹操》一文中，他对曹操在文学上的地位、贡献、见解，都给予较高的评价。在《曹操与三国演义》一文中，把历史上的曹操和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严格区别开来，针对“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好多同志因为要肯定历史人物曹操，又担心《三国演义》的曹操已经深入人心，于是便把矛头转向《三国演义》”的做法，提出截然相反的意见，并且说“认为历史上曹操是正面人物，文学作品中就不能是反面人物的见解，实际是不对的。”（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397—398页）文章用文学的观点看待文学作品，对当时的不良学风提出尖锐的批评，表现出一个正直学者的胆量和气魄。

魏晋六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发达的时期，要研究此时的文学，就不能不研究当时的文学批评。在这方面，逯钦立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陆机的《文赋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，其写作年代，杜甫认为，“陆机二十作《文赋》”（《醉歌行》），清代王鸣盛从之，以为“《晋书》本传无二十作《文赋》语，子美殆别有所见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49）何焯则

认为,即使非二十所作,然亦当作于入洛之前(见《义门读书记·文选》)。陆机入洛在289年,时年29岁。逯钦立不为古说所囿,写出《文赋撰出年代考》一文,通过仔细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陆机、陆云之间的书信,判定《文赋》作于301年,陆机时年41岁。结论可信,为学术界所接受。

文笔之别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,古人对此研究得很不够,后来阮元、刘师培、黄侃等人,虽然对此加以探讨,但或者囿于偏见,或者言之不详。逯钦立鉴于此种状况,写出《说文笔》这篇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章,对文笔说深加探究,将其分成两期。并通过仔细分析,用大量例证证明,最晚到东晋初年,“文笔”就已经指两类制作了。文指有韵的诗、赋、颂、诔等等,笔指无韵的书、论、表、奏等等。而经、史、子等专门著述,不入单篇的文笔范围。这是前期的文笔说,和大多数学者认为文笔之分始于南朝有所不同。逯钦立把南朝的文笔说定为后期,并将其分成两派:一派是传统派,一派是革新派。传统派以颜延之、刘勰、萧统为代表,他们以承用前期观点为主。而革新派以萧绎为代表,对文做了进一步的要求,即词彩华丽、感情动人而又合乎声律。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分类法,而是把文笔区分和文学评论相结合,形成了一种新文论。对此,逯钦立给予较高评价。他对文笔说深入细致的研究,是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总结和提高。

为了深入研究汉魏六朝诗歌,逯钦立还对钟嵘《诗品》进行了细致的校勘、分析,并将心得写成《钟嵘诗品丛考》。该文对其版本、序文、成书年代、评诗的体例、标准等问题,加以研究,其中不乏真知灼见。例如对《诗品序》,《历代诗话》本《诗品》不从旧本,将序文三篇总冠其首,致使文义殊不连接,他认为,“按三文分冠三品之首,当有错误,然亦不得合三文为一序”,“窃谓《诗品》卷首之文为原序,《梁书》本传所引者是也。中品起首之文则上品评人以后之附例,举一反三,明中下两品同之。下卷起首之文,自‘昔曹、刘殆文章之圣’迄‘闾里已具’为一段,乃中品卷中沈约以后之附语,专论声律,以诋沈声病之说,盖即在沈氏下,附此一段也。自‘陈思赠弟’至‘文采之邓林’一段,又当在全书以后,为卷末之总跋,列举名篇,以示学诗之规范也”(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465—466页)。这些话的正确与否虽然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,但至少启发人们对此进行深入的探索。

再如,对《诗品》的体例,一般人只见其用“九

品论人,《七略》裁士”之法,上文却从当时品棋、品书、品画等方面入手,仔细分析钟嵘从中学习、借鉴的东西,可见当时风气对《诗品》的影响。还有,对《诗品》的评论标准,后人多有非议,上文亦从当时批评风气入手,通过大量实例证明,钟嵘的评价在当时是客观、公正的。

研究齐梁诗歌,不能不研究四声,然而古往今来,这是一个难啃的题目,逯钦立知难而进,写出《四声考》一文。在文化史的范围内,详细考察四声的所谓“纽”,说明其创立的背景,辨析其与五声之异同,说明四声为体之所以重要,以及周顒发现之功不可埋没。并从文学史上探讨“声病论”的成因及主旨,揭示“永明体”的特色和句格,以及对后代诗歌的影响。这些成果,对齐梁诗歌的研究有重要意义。

总的来看,逯钦立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范围广阔,分析深入,处于当时的学术前沿。

#### 四

逯钦立身处新旧交替的历史环境中,既受到过旧学的熏陶,也接受了新思想的感染,在治学方法上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。

其一,古籍整理与文学研究并重。文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文学作品,一般来讲,这些作品距今时间越长,对其整理的必要性也就越大。因为在流传的过程中,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问题,例如,作品的真伪、写作年代、衍文、讹误等等,这些问题不解决,也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。清代学者深谙此理,在这些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。然而随着国门大开,西学东渐,真正能安下心来、踏踏实实、舍得下苦功夫以传统方式搞国学研究的人,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当然,清代某些汉学家为考据而考据,冗长烦琐,脱离实际,是不值得效法的。逯钦立不为急功近利之风所动,从目录学、版本学入手,对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字一句地进行校勘整理,前后持续二十余年,其对学术的专注执着,确实可嘉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在整理古籍的同时,也在进行学术研究工作,二者有机结合,互相促进。例如《汉诗别录》、《古诗纪补正叙例》等文章,都是他在整理汉魏六朝诗歌时写下的,而那些研究陶渊明的文章,也是他校注《陶渊明集》时写下的。可以说,若没有古籍整理作为基础,他不可能写出这批高质量的论文。同时,若没有对这一时期文学的深入研究,他也不可能搞出这样高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。

丁福保整理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之质量差，正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其二，注重言出有据，不尚空谈。客观公正，实事求是，一个学者应该具备这样的研究态度，逯钦立正是如此。在此基础上，他还务求立论必有根据，也就是用材料来说话，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。在文章中，他有时是先罗列材料，加以分析，然后再概括出结论。例如，在论述七言诗的产生时，先引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、《文选》卷43《北山移文》注引《董仲舒集》，说明七言名称之起，再引东方朔、刘向等人七言之作，详述七言的类型，最后才概括说：“总上所论，汉代七言，约有三类。一为中含‘兮’字之类，前举东方朔之七言是也。一为句句用韵之类，即刘向所作。而吾人目为正格七言者是也。一为句中用韵之类，则两汉七言谣谚是也。然溯源所以别流，览古所以征今，魏、晋七言，悉为句句用韵，名篇佳什，后先承美。此继乎汉代之正格七言也。”（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83页）这几句总结，虽然言辞不多，却是作者经过深入研究大量材料得出的结论，对人们了解七言诗的产生很有作用。另外，有时他又先提出观点，再用材料加以证明。例如，对汉代乐府民歌的体裁行式，先说“乐府诗常兼有三言四五言等，而杂揉成篇，其中变化多端，略无格律之可寻，然其辞句，以长短而有疾徐，极其纵横淫液之致，虽久谢丝管，若仍含音节者。此在《铙歌》、《相和》古辞及杂曲之类，盖莫不如此。”（同上书84页）然后列举了《有所思》、《上邪》、《乌生八九子》等全篇，及《巫山高》等11首汉乐府所用句式，另有五言、七言、八言等汉乐府的不同句式，以显示其杂言体之变化多端。证据确凿，令人信服。

其三，1950年以后，开始使用阶级分析法研究古典文学。应该说，逯钦立使用前边两种方法治学比较熟练，而且是成功的。到了五十年代，他一方

面并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治学方法，另一方面又试图使用新的方法，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。在文章的语言上，比原来变得通俗简洁了，大段的材料引证和推论过程也不见了。客观地说，他原来文章中有时引证过多，考据烦琐，非专业研究人员很难读下去。而此时他的文章正向通俗、普及的方面转化，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。使用阶级分析更是时风使然，此时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如此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《读陶管见》和《陶渊明集》中所附的《关于陶渊明》。给陶渊明上纲上线，处处用阶级斗争去分析，我们今天看来固然可笑，但是，当现实中阶级斗争需要“天天讲，月月讲，年年讲”的时候，把它运用到学术文章里也就不足为奇了，更何况逯钦立还有迫不得已的隐衷。另外，即使是在今天，学术文章中也不是绝对不能使用阶级分析，关键还是不要把它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、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绝对真理。应该说，逯钦立使用阶级分析是失败的，值得庆幸的是，他没有完全放弃原来的那两种治学方法，所以才能够为后人留下一批学术精品。

由于逯钦立的大部分著作在其病故后才得以出版，来不及做最后的订正，致使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。尽管如此，其失误与成就相比，毕竟是极少数，瑕不掩瑜。更何况当我们回顾百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史的时候，发现在古籍的校勘整理、注释和文学研究两方面，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的，不能不首推逯钦立先生。他的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、《陶渊明集》、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等著作，在读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并成为了解和研究这一段文学的案头必备书籍，这也使他成为近百年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中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。

（责任编辑：刘兵）